

鲁歌马征 著

金瓶梅纵横谈

北京燕山出版社



84782

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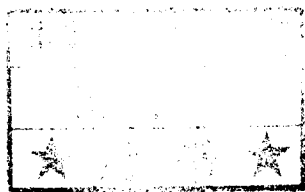
《金瓶梅》纵横谈

鲁歌 马征 著



200084684

2567



北京燕山出版社

京新登字209

《金瓶梅》纵横谈

鲁歌 马征 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38号)

北京地质印刷厂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10.625字数262千字

1992年2月北京第一版1992年2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6000册

ISBN 7-5402-0333-1/I. 0024

定价：7.40

谨以此书献给

1992年6月在中国召开的
第二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

目 录

《金瓶梅》与《查太莱夫人的情人》·····	(1)
漫谈《如意君传》与《金瓶梅传》·····	(15)
读《三续金瓶梅》·····	(32)
谈《金瓶梅》的四种版本·····	(44)
《金瓶梅》早期史料信息研究·····	(69)
《金瓶梅》当成书于万历中期·····	(92)
谈《金瓶梅》对万历帝宠郑贵妃的影射·····	(106)
《金瓶梅》作者不是冯梦龙·····	(119)
《金瓶梅》作者不是谢榛·····	(136)
《金瓶梅》写临清缘由初探·····	(147)
《金瓶梅》与临清及运河文化·····	(162)
《金瓶梅》正误及校点商榷·····	(182)
《金瓶梅》性文化意识批评·····	(221)
附录：故事内容介绍·····	(267)
1. 《金瓶梅》·····	(267)
2. 《查太莱夫人的情人》·····	(295)
3. 《如意君传》·····	(313)
4. 《三续金瓶梅》·····	(318)
后记·····	(335)

《金瓶梅》与《查太莱夫人的情人》

—

在世界名著中，有大段大段的性描写而令人惊心动魄的长篇小说只有两部，一部是中国的《金瓶梅》，一部是英国的《查太莱夫人的情人》。《金瓶梅》的作者是明代嘉靖至万历年间的“兰陵笑笑生”，我们认为他的真实姓名应是王稚登（公元1535—1613年）^①，《查太莱夫人的情人》的作者是戴维·赫伯特·劳伦斯（1885—1930）。这两部作品都是很有社会意义和宝贵的艺术价值的，同时它们的性描写又很突出。从这种含义上来说，这两部长篇小说可以称为古今中外的“两大奇书”，它们的作者亦可称为世界作家之林中的“两大奇人”。中外研究者们已普遍公认这两部小说是了不起的两大杰作。无疑地，对这两部小说及其作者是很值得继续深入地研究、探讨下去的。

正是由于这两部杰作的性描写都很突出，所以研究者们喜欢拿它们做比较。著名作家郁达夫和林语堂曾分别在1934年和1946年所写的文章中，对两书的性描写做过比较，结论都是《查太莱夫人的情人》的性描写比《金瓶梅》的性描写高明得多。这两部书尽管都有较多的性描写，但它们在总体上都是很有价值的文学作品，这是无法否认的。因而，它们都应该在有限的范围内发行。对于《金瓶梅》，已经做到了这一点——词话本全本和崇祯本全本

已分别由文学古籍刊行社、北京大学出版社和齐鲁书社出版发行，这是正确的；《查太莱夫人的情人》的性描写比《金瓶梅》的性描写健康、含蓄、优美得多，因而它至少也应该在有限的范围内发行。过去，英、日等国曾对它实行查禁，给世界文学与文化事业造成了一定的损失和不良影响，后来也都开了禁。这一教训值得记取。在近来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等书中，对《查太莱夫人的情人》都作了高度的评价，这一态度是公允的。

《金瓶梅》的作者是反对纵欲滥淫和贪色的，书中处处写到了纵淫贪色之害，便是明证。但是，书中又极热衷于性描写，前后有一百处左右，淫秽文字达万言以上。作者对他笔下性交的男女双方及其性行为，在伦理观上多持否定与鞭挞态度，但他在做具体的性描写之时，却又津津乐道，兴味极浓，多写他们性交时的畅美快活、声音之娇柔、性器官之悦目可爱、裸体之美；例如，对他鞭答的非正当性交——西门庆分别与王六儿、林太太、如意儿、贲四嫂、李桂姐、郑爱月等交媾时的性器官、体态、性行为、性感受等等描写多是如此。这一切都说明了：作者的思想、感情、心态处于十分矛盾的状况之中。他的理论、宣言和情趣、描写是互相抵牾的，他的头脑是一个相当矛盾复杂的合成体。他高张反对贪色纵淫的旗帜，却大量兜售的是欣赏色情滥淫的货色。《金瓶梅》的创作意图正如作者笑笑生之友欣欣子在《序》中所说的：“无非明人伦，戒淫奔，分淑慝，化善恶。”（慝，音 tè，邪恶之意。）但他的如上性描写和欣赏的态度却正好与此相违。他对这些把玩赞美一番之后，最终却又归结为：绝不能贪于这些情色与快乐，否则就会像西门庆那样三十三岁短命而亡！他认为潘金莲招来杀身之祸，李瓶儿、庞春梅的“早归泉”，和炫色而情放即“淫逸”有关。这对读者无疑是一个警钟。但王六儿、林太太、如意儿、贲四嫂、李桂姐、郑爱月等人并未早死，这岂不等于说非正当的男女交媾滥淫、及时行乐也未必都短寿，是值得作者欣赏的么？何况书中还不只一次地宣扬过及时行乐的思想呢！

在作者的头脑中是及时行乐和反纵欲滥淫两种思想的共存与相消长。

他之所以对他否定的黄色滥淫作大段大段的性描写而又抱玩味欣赏态度，说明他对此兴趣很浓烈，这正是低级趣味的表现，也说明了他在写这些不堪入目的淫秽文字时的态度是不够严肃的。他写下这么多的色情文字，一个主要目的是为了卖高价以增加经济收入。屠本峻在《山林经济籍》中就披露了这样的事实：王宇泰“以重资购”《金瓶梅》抄本二帙。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也记载：冯梦龙曾“怂恿书坊以重价购刻”《金瓶梅》抄本（被沈拒绝）。没有任何记载可以证明：在《金瓶梅》初刻本问世以前，或《金瓶梅》抄本流传以前，社会上已有民间艺人在说唱《金瓶梅》故事。中国历代统治者也不允许对群众长篇连续地说讲有大量露骨的淫秽内容的东西，否则官方定要对说讲者逮捕法办，严惩不贷。因而《金瓶梅》绝不是民间艺人说唱的本子，而是文人秘密的个人创作。作者写下这么多的淫秽文字是一件很不光彩、不名誉的事，因而他不愿也不敢暴露自己的真实姓名，这说明了作者也感到写下这些淫秽文字是不好的。但他为了生计又不得不如此。然而不应讳言，他写这些淫秽文字对社会、对读者采取的是不负责任的态度。

《查太莱夫人的情人》与此情况不同。总的来说，它的性描写是健康的，作者的创作态度是严肃、认真的，他敢于对社会、对读者负责，因而他敢于署自己的名字而无所畏惧。这些性描写是全书中不可缺少的有机构成部分，删除不得。写这些文字的目的不是为了卖高价，这正好与《金瓶梅》的写作情况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照。《查太莱夫人的情人》于1928年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出版后，英国的发行家们力劝作者出一个删改本，删去性描写部分，给作者以丰富的报酬，他们要作者告诉读者：这一删改本是一部优美的小说，所有“猥亵”、“淫秽”都没有了。劳伦斯是比较穷困的，因而有点被他们的黄金引诱了，便开始删改。但作者随即

深切地感到“那是不可能的！那等于用剪刀裁剪我自己的鼻子。书流血了。”于是他停止删改，谢绝发行商们丰厚的报酬，而决意在法国印行廉价的不作删改的大众版。②《金瓶梅》的作者为了多卖得银子而大写特写淫秽文字，致使其中的不少描写成了全书的赘瘤；《查太莱夫人的情人》的作者为了保住书中的性描写而放弃接受一小桶黄金的重酬，并申明这些性描写像人的鼻子一样不能割掉。两书的这两种完全相反的状况，无疑决定了两书中性描写的必要与否。

二

文学作品中表现自然的、健康的肉感和肉欲，不是它的缺点，而是优长之处。恩格斯在《格奥尔格·维尔特》一文中精辟地指出：

维尔特所擅长的地方，他超过海涅（因为他更健康 and 真诚），并且在德国文学中仅仅被歌德超过的地方，就在于表现自然的、健康的肉感和肉欲……我不能不指出，德国社会主义者也应当有一天公开地扔掉德国市侩的这种偏见，小市民的虚伪的羞怯心，其实这种羞怯心不过是用来掩盖秘密的猥亵言谈而已。例如，一读弗莱里格拉特的诗，的确就会想到，人们是完全没有生殖器官的。但是，再也没有谁像这位在诗中道貌岸然的弗莱里格拉特那样喜欢偷听猥亵的小故事了。最后终有一天，至少德国工人们会习惯于从容地谈论他们自己白天或夜间所做的事情，谈论那些自然的、必需的和非常惬意的事情……③

要能够做到表现自然的、健康的肉感和肉欲，就必须以进步的伦理观来着力于表现健康的、美好的爱情。王实甫的《西厢记》、汤

显祖的《牡丹亭》、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劳伦斯的《查太莱夫人的情人》都是这样做的。

《金瓶梅》的情况要复杂得多。它的性描写主要以豪恶西门庆分别与潘金莲、孟玉楼、李瓶儿、吴月娘、宋惠莲、王六儿、李桂姐、郑爱月、如意儿、林太太、贲四嫂、惠元的性交为表现对象。一个男的淫媾十多个女性，这是男性对妇女的恣意玩弄，谈不上爱情。西门庆先后娶孟玉楼、潘金莲、李瓶儿为妾，都带有浓重的欺骗成分。孟玉楼丧夫（杨宗锡）而决意改嫁，具有新进的人生价值观念，反“从一而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旧道德，值得赞美。潘金莲是张大户送给武大郎为妻的，她不爱奇矮、特丑、懦弱、愚钝、一味嗜酒的武大，也具有反道统精神。李瓶儿不爱一贯眠花卧柳、不理正事的丈夫花子虚，也表现了对旧礼教的叛逆；她不爱有性功能障碍病的另一个丈夫蒋竹山，亦无可厚非。但她们三个女子都情愿给有妻妾的西门庆去做小妾，却不值得颂扬；她们嫁西门庆之后也都无幸福、美满的爱情生活可言。《金瓶梅》也写了西门庆对书童、王经两个男童以及对王六儿、潘金莲两个女性的鸡奸，这更是龌龊不堪的丑事。《金瓶梅》还描写了陈经济与潘金莲、庞春梅、冯金宝、韩爱姐的性行为。陈经济与西门大姐的婚姻是家庭包办的，他们一直不相爱，西门庆又屡屡负心于潘金莲。在这种背景下，陈与潘的偷情含有爱情成分。但正如恩格斯所肯定的那样：“性爱按其本性来说就是排他的”^④，当陈和潘、庞三人在一起交媾，都失去了这种排他性，因而也都扔掉了爱情的忠贞时，它的性质也就变成了寡廉鲜耻的乱淫。陈经济与葛翠屏洞房花烛夜“倒且是合得着，两个被底鸳鸯，帐中鸾凤，如鱼似水，合叠欢娱。”陈后来与韩爱姐私通后，“心在爱姐，一向未与浑家行事”，对葛很冷淡，这只能说明他已喜新厌旧；何况他仍与庞春梅通奸，对庞、葛、韩三个女子也都谈不上什么爱情。以进步的伦理观视之，第90回来旺与孙雪娥的偷情，第91回孟玉楼改嫁李衙内，都含有美好的爱情成分。但

对他们的性描写，特别是对后者，比起对那些不正当、不健康的性描写来说，要简单得多。第12回潘金莲与琴童的偷情，也含有爱情的因子，男女双方对纲常名教、主子权力、宗法制度和等级观念都是大胆地反叛；但那性描写却基本上是从《水浒传》中对裴如海和潘巧云的性描写抄袭来的，且将原来文雅含蓄的诗句改得粗俗肉麻不堪了。

《查太莱夫人的情人》的性描写没有《金瓶梅》那样多——只有十多次，总共三千字左右，内容也比较单纯——只是描写克利福·查太莱男爵夫人康士丹斯（昵称康妮）和她的情人蔑克里斯，特别是和她的新情人梅乐士的性生活。康妮在性史上并不是一个纯而又纯的女子，不像她的丈夫克利福那样单一——只和一个异性（自己的配偶）发生过性关系。然而“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尽管她先后和四个男子有过性爱，但她是一个高尚的人，她的心灵像金子一样宝贵，不像她的丈夫那样自私和卑鄙。

康妮在认识克利福以前的1913年，在德国德累斯顿学习音乐时，曾和一个爱音乐的德国男青年有过性生活。但大战爆发后，他在1914年圣诞节前战死了，康妮为此而痛哭了一场。后于1917年在英国和克利福结了婚，蜜月后克利福重返前线，六个月后他一身破碎地被运回英国，从此下半身成了瘫痪，丧失了性功能。问题不在于他是否有性能力——康妮曾觉得超乎性欲而不求满足的相亲相爱是可喜的，亲情比性交更深刻、更直接；而在于克利福承袭了男爵爵位做了煤矿主以后，变得越来越自私自利、低劣与寡情——连亲情也没有了，连温暖的肌肤的简单接触也欠缺。他对妻子缺乏温热与慈和，有的只是冷漠。他和民间的来往极少，根本不把煤矿工人们当成人；他写些内容空无一物的小说，却极慕虚名，不惜用一切卑鄙的手段来自吹自擂，或借别人之力来吹捧它们，给自己造舆论。他邀请正走倒霉运、被伦敦时髦社会攻击的剧作家蔑克里斯来勒格贝家中，因蔑克的剧本曾在美国上演，拥有几百万听众，他可利用蔑克的帮助在美国成名。

康妮同情和怜悯受人们排挤和唾弃的蔑克，感到这个可怜无助的人是以自力挣扎着前进的，克利福比他浅薄无聊、自作聪明、蠢笨而又卑污得多。她和蔑克都是孤寂的人，蔑克也需要她，从蔑克那里发出一种急迫的求援，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相爱而偷情。恩格斯说得好：“如果说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那么也只有继续保持爱情的婚姻才合乎道德。”^⑤克利福既然首先不继续保持爱情了，那么不合乎道德的自然是克利福和这一婚姻，而不应责备康妮。既然彼此相爱是夫妇的义务，那么当克利福对康妮连温情也失去了之时，又怎能责怪康妮在心理和行为上所发生的倾斜呢？

康妮经常和蔑克幽会作爱。她逐渐认识到蔑克的天性是要破坏一切关系而重新成为自由、孤独、寂寞的“野狗”的；蔑克在剧本中吹捧克利福，他对于空虚的炫耀比克利福更高明，他也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他有性功能障碍，每次作爱都早泄。但她依旧喜欢在蔑克的极快感完毕之后，用自力得到强烈的肉的快感，蔑克也依旧喜欢去满足她。只这一点便足以维持他们之间的关系，足以给她一种微妙的自信。蔑克向康妮求婚。有一天夜里康妮在靠自力达到性高潮之后，甚至想答应和他结婚了。但蔑克突然挖苦她不能和男人一起完毕，喜欢一个人自己干着完结；又说自己等着女人享受，那决不是好玩的事。他自己性功能不健全，又缺乏性科学知识，却责备无辜的康妮，这是她有生以来所受到的最残酷的打击。尽管蔑克曾给过她金碧辉煌的许诺，保证给她一切幸福和快乐：衣裳、珠宝、夜总会、所有的时髦东西、旅行、到处受人尊重，但她的心并不为之所动。他的粗野把她对他的感情完全破坏了。后来蔑克又向她求婚，要和她一起去尼斯、西西里、非洲等地旅游，她也知道跟着他能得到很多金钱，但她还是拒绝了他。如果说她和蔑克的私通不值得苛责的话，那么她放弃了物质生活上的种种享受而断然与蔑克分手，就更是值得赞美的了。

康妮之所以爱上克利福的守猎人梅乐士，是因为她感觉到梅乐士对妇人特别地仁慈和温暖。这正是男性对待妇女的最为难得可贵的美德。劳伦斯在这部小说中多次强调温柔，他甚至曾经想把书名改成《温柔》，于此即可看出其中的端倪。他在给拜纳的信中甚至说温柔这种品质将代替领袖，作为整个世界重获健康的最为必要的品质。小说女主人公康妮也恳求她的情人梅乐士永远不要忘记温柔。⑥凡是正常的夫妇都希望二人柔情似水，彼此恩爱。正常的妻子总是喜欢丈夫温柔多情，关怀体贴。她需要他的倒真是“儿女情长，英雄气短”，这是就夫妻关系而言的；当然也并非不希望他对待事业和工作是一位真正的英雄。鲁迅诗云：“无情未必真豪杰”⑦。或者可以这样来理解：真正的豪杰应是最多情的。马克思最喜爱女人的优点是“柔弱”⑧。或者可以这样说：柔和也是作为妻子和女人的一种最好的美德。梅乐士的妻子白黛恰恰与此相反，她对丈夫极其凶恶粗暴，又和几个男子私通，导致了她和丈夫感情的彻底破裂。

康妮对梅乐士的爱，是在同克利福、蔑克的强烈对比中滋生与发展起来的。没有对比就没有鉴别，有憎恨才会有更热烈、更深沉的挚爱。克利福的冷酷无情、以自己属于统治阶级而自傲、发狂地追逐金钱与飞黄腾达、庸俗、虚伪、对妻子的欺罔、对几千名矿工的压榨与歧视；蔑克的粗野、缺乏对女性的体贴与尊重、和克利福同样的自私自利，凡此种种，都使她反感和厌恶。他们固执地不肯改正，这就使她不可能再爱他们。正如列宁所说：“爱情是不可以强求的”⑨；康妮在爱情上与克利福、蔑克分道扬镳，完全不值得大惊小怪。梅乐士对康妮真诚地怜悯、温柔地安慰、和蔼而热情，都是从来没有男人对她这么做过过的。这些正是她爱他的地方。康妮出身于爵士家庭，又身为矿场主男爵夫人，却勇敢无畏地冲破了森严的门阀等级观念，不顾地位与贵贱的悬殊，不怕舆论的谴责，爱上了出身于矿工家庭、身为仆人的梅乐士，追求真正的爱情与幸福，甘愿抛弃荣华富贵，这无疑

是具有进步意义的。恩格斯说：“如果感情确实已经消失或者已经被新的热烈的爱情所排挤，那就会使离婚无论对于双方或对于社会都成为幸事。”他还高度赞扬“由爱情而结合的婚姻被宣布为人的权利”，并且不仅是男子的权利，而且也是妇女的权利^⑩。以此来观照康妮要求与克利福离婚，梅乐士要求与白黛离婚，康妮与梅乐士由偷情到结婚，都不仅不值得责备，而且应该承认康妮和梅乐士之间是非常美好的爱情。《金瓶梅》中不但缺乏这种美好的爱情描写，而且连同样是中国古典小说的《红楼梦》中那样较多的美好爱情的描写也极少有。

《查太莱夫人的情人》的男主人公梅乐士也与《金瓶梅》的男主人公西门庆绝不相同。西门庆是一个一贯玩弄女性的大淫棍，他奸淫过的妇女不计其数，书中明写的就有22人之多，另外还鸡奸了两名男童。他的行为表现像是欧洲的“杯水主义”——它鼓吹满足性欲和爱情的需要像喝一杯水那样简单和平常；西门庆玩一个女人也像喝一杯水那样随便。列宁说过：“我毫不同情杯水主义”，“在性生活上，不仅应该考虑到单纯的生理上的要求，而且也应考虑到文化的特征，看它们究竟是高等的还是低等的。”恩格斯在他所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指出：“把一般的性的冲动发展和提炼成为个别的性爱，是何等重要的事。……自然，渴是要满足的。但难道正常环境下的正常人会爬到街上去喝那里的脏水，或者从那沾有许多人的唇脂的脏杯子里喝水吗？”^⑪在性生活上，梅乐士是高等的，西门庆则无疑属于低等。西门庆也惯于喝脏水和沾有许多人的唇脂的脏杯子里的水，如李娇儿、卓丢儿、潘金莲、吴银儿、郑爱月、林太太就都是，而他比她们还要肮脏得多。梅乐士尽管在爱情史上也不是单一的，他曾先后和四个女子相恋，但他绝不像西门庆那样淫乱和卑劣。他爱过一位校长的女儿和一位女教员，结果都因为她们对性爱不感兴趣或憎恨性爱而分手。性科学知识告诉我们：性爱是爱情、婚姻与家庭的基础。恩格斯也说“不以相互性爱和夫妻真正自由同意为基

础的任何婚姻都是不道德的”^⑫。梅乐士深恶不要性爱的女人，是很正常的表现。后来他娶了白黛。尽管她需要性爱，但丈夫辛苦工作回来她连晚饭都不管，经常无理取闹、吵嘴、打架，过性生活时又故意使劲地撕扯阴茎，后来又姘上了几个男人，显然他们夫妇的感情已彻底破裂。在这种情况下，梅乐士与康妮相爱，要求与白黛离婚而与康妮结婚，也都是合乎情理与道德的。他和康妮都不向克利福男爵屈服，他甚至不惜被克利福辞退而丢掉饭碗。他不是杯水主义者，他忠实于对康妮的爱情，表白自己是爱贞洁的，能守贞洁是可爱的、佳妙的事，“男子们怎么能够丑恶地调情泛爱”。显然，梅乐士与西门庆是有天壤之别的。梅乐士的形象代表了作者的观点。作者说过：“没有什么比乱搞更让我恶心了”。他不是禁欲主义者，但也反对纵欲乱淫。他始终都在努力做同一件事情：“使性关系变得健康、宝贵而不是可鄙”，这是他高尚的追求与使命。^⑬

在性描写上，就整体性而言，《查太莱夫人的情人》是优美而含蓄的，多用比喻、象征、间接的语言，其美正在虚实隐显之间，值得肯定；而《金瓶梅》则直白、露骨、粗俗、拙劣之处甚多，不宜盲目恭维。但对劳伦斯的性描写也不应一味地唱赞歌，正如英国文学批评家克默德评论的那样：“《查太莱夫人的情人》和劳伦斯的大多数作品一样，也偶有令人震惊的败笔；他时而放纵自己使用一些猥褰的性方面的双关语，这些双关语在这样的语境中无疑是一个危险的错误”^⑭。从内容上来说，《金瓶梅》中的西门庆先后鸡奸了仆妇王六儿和小妾潘金莲；无独有偶，恰然巧合，《查太莱夫人的情人》中的梅乐士也先后鸡奸了妻子白黛和情妇康妮。尽管前者描写得颇为刻露，后者表现得相当蕴蓄，但在性行为上并无二致。诚然，二者的内涵是迥异的：西门庆此举是对女性别出心裁的玩弄与蹂躏，梅乐士此举则是对虚伪的羞耻心的焚毁与净化，对人的沉浊杂质的溶解而使之纯洁，以此“蒙化型的鸡奸”象征着必须用阳刚之美来焚毁虚伪的英国，使之净化

而新生，犹如传说中的凤凰在烈火中自焚后而更生那样鲜美异常（劳伦斯为《查太莱夫人的情人》设计的封面，画的就是火焰中自焚的凤凰，他为自己设计的墓碑也是一只凤凰图案，均有此象征深义^⑤），并且具有复杂的哲学内蕴；但两部小说中的这种齷齪行为都不可取。《金瓶梅》以此来揭露西门庆的惊人丑恶，是正确的；而《查太莱夫人的情人》却对梅乐士此举予以赞美，认为女人“最需要它”，“甚至想把精神纯洁化、灵敏化起来，也得要这唯一的肉感才能成功”云云，却未必然，白黛并未“精神纯洁化”就是明证。作者在小说《爱恋中的女人》中也描写和肯定过鸡奸，并试图区别“纯消亡型的鸡奸”和“蒙化型的鸡奸”。作者在理论上对后者的赞美，恐怕和他对情人弗莉达（他后来的妻子）的性行为有关（《查太莱夫人的情人》也带有自传性成分，这是不成问题的），是对自己的这一行为的巧言回护。把这种性行为圣理化，提倡在普遍的男性对女性的身上进行应用，不但是对广大妇女的侮辱，而且在意识形态、心理负荷、生理卫生和人体健康等方面都是有害的。

三

评论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必须把它放在产生它的时代背景之下考察。《金瓶梅》大约创作于1591—1597年的中国封建社会，《查太莱夫人的情人》创作于1926—1928年的资本主义的英国和意大利。前者比后者要早330多年，笑笑生也比劳伦斯早出生350年左右。在社会制度的形态上，后者比前者先进得多；反映在作家的观念上，劳伦斯当然比笑笑生的思想进步、民主与科学。二人生活的年代与国度大相径庭，因而对这两部小说不能用同一个尺度去衡量。

我们中国人既不应妄自尊大，也不宜妄自菲薄；既不应贬抑西方，也不宜数典忘祖。在评论中外文学作品时，态度应当客观

和实事求是。尽管在性描写方面，《金瓶梅》远不如《查太莱夫人的情人》优美而含蓄，但就整部小说的思想内容与艺术技巧并结合各自产生的特定时代而论，《金瓶梅》比《查太莱夫人的情人》在整个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更高，这应是不成问题的。

《金瓶梅》近百万言，《查太莱夫人的情人》只有三十万字，篇幅仅是前者的三分之一。《金瓶梅》描写的社会场景要广阔得多，内容也丰富得远。它淋漓尽致地揭露了皇帝的昏愤、荒淫，朝廷的腐败、失政，权臣的卖官鬻爵、祸国殃民，地方官吏的贪赃枉法、巧取豪夺；官僚集团从上到下勾结一气，盘根错节，形成一个关系网，徇私舞弊，陷害忠良与无辜，开脱罪犯，为非作歹，无恶不作；富商兼官僚奸占与污辱众多妇女的惊人罪孽；展示了上层社会的骄奢淫逸和下层人民深重的苦难；暴露了妻妾、奴婢、收用、娼妓等制度的丑恶与不合理，科举、任免、刑法等制度的虚伪与荒唐；从天子朝廷到市井生活，从官绅交往到风俗民情，三教九流，五行八作，无不备载。它是十六世纪末叶整个中国社会的一面镜子，是一部大百科全书式的文学巨著。《查太莱夫人的情人》比它单薄得多，远没有它那样厚重，还不能进入“大百科全书式”的最高档次，在规格上比它要低一等。

当然这两部杰作是各有千秋，不能互相替代。《查太莱夫人的情人》中也有很深刻的思想内容，如揭露以资本家、矿场主、男爵克利福为典型的统治阶级的专横凶残，鞭撻其不把广大工人和人民群众当作人、扬言要永远统治他们的反动思想与行为，反映了尖锐的阶级对立；同时也反映了工人阶级为摆脱苦难而求生存的反抗与斗争；作品表现了统治者追名逐利和资本主义工业化对人与人之间亲热、和谐关系的破坏，对人性的扭曲和冷化，对人的自然本性的摧残与扼杀；作品通过矿场主克利福要妻子康妮“和另一个男人生个儿子”以继承家业及对工人的统治，后却因康妮为雇工梅乐士怀了孩子而大怒，揭露了统治者的虚伪与残暴；而写康妮宣告这孩子绝不作矿场主男爵的继承人，其寓意更